

第六章 結論：解構文化治理

新竹市在 1990 年代後期迄今，不論是地方政權主導的官方文化治理，還是都市社會運動訴求的史蹟保存與再利用，以及社區自主行動，皆進行了以文化與歷史之名的公共空間再造。本研究首先針對 1980 年代後期以來，新竹市文化治理的歷史進程、各階段的性質與要項，以及都市政權的組成和運作方式，在鉅觀空間尺度上，進行概念化都市政治的文化面向，並且提出批判性的分析，以了解公共空間再造的社會脈絡。其次，嘗試介入日常生活的微觀地理，選取了三種類型的公共空間再造案例，進一步探究文化治理機制中的公共空間生產過程、實踐機制、行動者的身份與位置、權力關係、公共性問題。最後，一一拆解由都市政權中不同行動者形構的文化治理，指出 1990 年代後期以來新竹市文化治理的困境和危機，並且選擇邊緣再出發。

6.1 新竹市的結構分析：都市文化治理與科學園區

國內討論新竹科學園區與新竹地方之間互動過程的論文，均說明了新竹科學園區形構的「區域創新體系」之特殊積累體制，讓新竹區域經歷了都市再結構過程，包括了產業、社會人口及空間的重構，其形式展現為更大尺度的區域專殊化和兩極化¹，明顯反映為環境危機、高科技勞動力的流動與分化、社會空間隔離分裂、生產性基礎設施和都市服務不足等層面的新都市／區域問題（楊友仁，1998；蔡亮，1999；陳柳均，2001）。特別是 1990 年代之後，國家領導產業的能力減弱，並且業已無法主導科學園區設置區位決策，以致形成激烈的城市競爭，科學園區的空間發展歷程演變為地域政治社會過程²。面對這個高科技區域不均

¹ 例如楊友仁（1998、1999）分析在新竹科學園區新工業空間的形構過程中，新竹區域的產業再結構趨向，指出基礎性產業從傳統四大工業部門轉移至微電子工業部門，其中製造業部分形成了新興微電子產業興起（擴大優勢）及傳統地方性工業衰退（喪失優勢）之兩極化發展；三級產業與營造業因應家戶消費與住宅需求的刺激而發展迅猛，也吸納了區域傳統製造業衰退後所釋出的部分勞動力；然而，三級產業中重要的生產性服務無法在新竹區域自給自足，因而仍是台北都會區的三級產業基礎來提供。

² 楊友仁（1998）指出新竹科學園區早期乃是透過國家政策和國家創新體系來發動產業發展，組織本地和國家資本在新產業萌芽期將風險「社會化」，並培養人才建立民間技術能力，為本地產業體系奠定基礎。而在 1990 年代之後，國家領導產業發展能力已經減弱，並且國家為求突破竹科三期徵收的困境（新竹縣），亦作為區域平衡發展的召喚，因而提出第二科學園區的宣示，地方國家循地域社會政治網絡組織起影響力直達中央的地方成長聯盟（南科），使得國家無法主導區位決策以致形成激烈的城市競爭。科學園區的空間發展歷程遂成為地域政治社會過程，全球地方化的時空形勢是發展性國家的歷史落幕，以及發展性地方國家興起的時刻，同時也是地域重建的歷史時勢。

等發展的社會－空間過程，這些論文即便賦予地方政府（甚至是區域政府）在全球經濟下的新的角色和使命（楊友仁，1998；蔡亮，1999），卻未瞥見且說明在現有的政治體制的地域框架下，地方政府如何調節超越其治理層級的科學園區積累體制之結構性矛盾，以及化解與深化此矛盾的都市治理過程。

因此，我在第二章中彙整並概述 1985 至 2001 年期間新竹市的地域計畫、文化治理歷程，以及市民社會的形構，以探究新竹市政府因應科學園區和城市競爭下的治理過程，大致上可概略分為兩個階段。首先，從 1988 年市府提出「文化科學城」城市定位至 1993 年中央文化政策轉型前，「新竹科學城計畫」為這個階段的主要地域計畫，此計畫最初為新竹市政府結合科學園區管理局、清大、交大及工研院，共同規劃新竹市成為一座科學城，之後計畫範圍逐步擴大至新竹縣和苗栗縣，不過因區域整合困難且中央並不積極推動，最後成為中央、地方和園區為求其利而各自挪用的紙上藍圖。這個階段的文化治理為國家主導，期間兩任市長（任富勇、童勝男）的文化施政著重於提升生活環境與市民素養的大型文教硬體建設和精緻藝文展演，以及辦理古蹟維護等方面，文化意義指涉在中華道統的國族認同和高科技現代化主軸。基本上，市府並未因文化科學城的定位而提出完整且具體的地方文化計畫，主要的市政策略為擴大研擬科學城計畫。除了抗爭李長榮化工公害的環保運動，市民社會的文化領域在這個階段相對顯得沈寂，不過也出現了由政治和文化菁英發起的「新竹風雜誌」地方性刊物，針對新竹地方事務加以報導以及提出批判與建言。

其次，1994 年地方文藝季政策至 2001 年蔡仁堅市長任期結束，科學城計畫逐漸顯露破局的端倪，期間兩任市長重新研擬僅針對新竹市範圍的地域計畫，分別為「新竹市綜合發展計畫」（童勝男，1997 年）、「綠色矽島實驗城市建設計畫」（蔡仁堅，2000 年），前者的發展目標為建立新竹市成為兼具地方特色的國際化科技都會，主要為打造因應科學園區生活機能的高品質生活環境；後者則訴求高科技產業與城市發展共生共榮之「園市合一」理念，著重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地域自主性。這個階段的文化治理機制與場域越趨複雜，在童勝男第二任任期期間（1994-1997 年），官方文化治理主要為文化中心來策動；在蔡仁堅上任後（1998-2001 年），則是優先進行城市景觀空間再造的城市建設計畫。一來中央文化政策轉型後，相應而來的文化政策地方化取向，以及文化經費補助；二來逐漸萌芽市民社會的民間文化團體訴求 / 挪用文化來批判都市現實，以及尋求資源與發展機會。文化治理演變為各種行動者競奪 / 協商都市意義與認同的文化戰場，表現在挖掘地方文化特色、書寫庶民記憶、打造文化產業（玻璃）、文化節慶奇觀、形塑城市獨特性、召喚市民意識與認同、營造多元族群文化、歷史空間保存與再利用、城市景觀美化、市區街道空間改善、博物館群計畫等面向。

綜觀新竹市近 20 年來的地域計畫與文化治理歷程，可以看到文化治理逐漸

浮現為市政建設和地域計畫中重要的一環³，特別是 1990 年代後期以來，市府主導了一系列城市空間再造和景觀美化的建設計畫。然而，文化治理逐漸成為都市政治的主要議題，除了文化政治層面的轉變（國家文化政策和民間團體的訴求），更是在新竹市特殊結構特質下，市府在因應科學園區和新竹地方社會所採取的治理策略。

在現有的地域政治框架下，新竹市政府身為新竹市正式層級的政治統合組織，必須在超越其控制權的科學園區、反映在地方社會的新都市問題，以及和其他城市競爭之間的夾縫中找尋出路和施力點，從文化科學城的提出到城市空間再造，這一連串的地域計畫和文化治理即是市府企圖保有競爭優勢，甚至是主導發展的努力。也就是說，民選市長必須在提出符合市民期望的市政總體願景之選舉壓力下，一方面宣示並非獨厚科學園區的經濟發展取向，例如提倡文化產業和象徵經濟（如玻璃）以作為城市發展的另一條路徑；另一方面，面對激烈的城市競爭（尤其是中科、南科、竹北市），市府也要確保新竹的生活品質和土地供應來留住竹科廠商，來穩固住竹科繼續在新竹市發展的計畫，而涵蓋地方文化和園區發展的「文化科學城」定位和「綠色矽島實驗城市建設計畫」就是在這種市府和園區的弔詭關係之中因應而生。換言之，因應新竹科學園區形構的特殊積累體制，市府必須配合竹科的發展所需，提供良好的空間品質（生活環境和交通運輸）來做為竹科的勞動力再生產條件，亦即市府的都市治理過程為支持科學園區的積累體制之政治與社會文化機制和實踐。然而，市府的空間調節模式並非全然為了支持科學園區發展，而是著眼於新竹市本身的發展，也就是站在地方政府的本位來看，市府必須依循其治理範圍的地方社會需要和市長選舉的邏輯，以及面對臺灣其他城市，甚至是全球城市的競爭，在城市發展策略上取得主導地位。市府提出兼顧地方文化和科技發展的都市治理策略，表面上看似為支持竹科資本積累的調節模式，根本上卻是奠基於市府和竹科的結構性緊張關係之中。

放在市府的空間調節模式和竹科的積累體制相互支持卻蘊含緊張的關係來看，1990 年代後期以來官方文化治理中以文化 / 歷史之名的城市風貌再造計畫，包括書寫庶民記憶、重構城市歷史（竹塹城）、博物館群計畫、東門城廣場美化案、護城河改善工程，以及主要街區景觀改造等等策略，市府透過歷史記憶書寫與再現、規劃論述以及藝文節慶儀式，吸納 / 召喚了文史工作者、學者、建築師、規劃者、藝文團體、市民等，共同建構新竹市的認同與集體記憶。竹塹城的文化與歷史成了市府獲取都市文化治理策略政治正當性的手段，更深化了新竹市與其他城市（特別是新竹縣）、竹科的結構性矛盾，並且也隱含著另一個層次

³ 楊友仁（1998：5-32~5-33）亦表示三級產業分類範疇中的文化生產服務業（包括個人工作室、劇場及其他表演空間、技藝表演、藝文服務業，其主要性質為文化生產與再生產、象徵符碼生產等事業）、管理服務業（關乎國家權力支配、調節整合與正當性，包括軍事、獄政、政府人員、政黨），以及其他服務業（包括專業教育、語言教育、都市資訊推廣），這三類服務業因缺乏具體的統計資料而未納入研究分析。而本研究的文化治理（和文化經濟）正可補充說明他無法處理的這三類範疇的一部分。

的吸納 / 排除邏輯。。

6.2 以文化 / 歷史之名：誰的文化？誰的歷史？

在第三章中，我特別選取市府譽為臺灣公共工程典範的東門城廣場美化案和護城河景觀改善工程，作為官方文化治理的代表，並進一步探究和解構市府進行的城市風貌再造和城市意象之邏輯。1998 至 2001 年，蔡仁堅擔任市長期間，展開以城市風貌再造為主的文化治理，一方面擴大執行東門城廣場美化案，透過公聽會、公開競圖、新竹 170 系列的城慶奇觀活動等方式，在市府與專業規劃者制訂的遊戲規則下，形構出市民參與公共空間再造的機制，以及台灣公共工程的典範；另一方面，市府直接委託專業規劃者，進行大量的歷史空間再利用為多種主題的博物館，透過媒體與市政文宣品將博物館群計畫，營造出多元面向而形構為城市獨特風格，藉此召喚市民多重主體身份及城市認同感。地方政權透過一明一暗的公共空間再造機制，緊扣著專業規劃者霸權與媒體宣傳機器，操弄出市民參與的表象，刻意掩飾了博物館群計畫中歷史空間與博物館主題的專斷配置，以及市民主體空缺的空間再造過程，藉此營造出朝向市民城市的官方文化治理。

在第四章中，空軍十一村保存與再利用行動和辛公館保存行動，則揭露了官方文化治理所營造的市民城市假象，以及市府緊握不放公共空間的主導權與再現權力。在辛公館保存行動中，由於交通部核撥停車場興建經費，引發了市府採行停車場與辛公館的共構設計，以及由清大學生和竹中校友組成的搶救小組訴求原封不動保存之間的爭論，雙方皆設法挪 / 運用建築師、學者、專業規劃者的論述，透過媒體宣傳機器向市民遊說、勸說，來鞏固各自立場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確立了保存結果之後，新市府借力使力推動再利用為辛校長人物紀念館，而搶救行動小組部分成員也直接或間接加入市府主導的再利用規劃過程和整修工程，共同再造 / 現出辛校長全人教育理念的私人空間之紀念館。

湖畔民眾俱樂部進駐空軍十一村的行動則欲扭轉史蹟保存運動只爭取保存，不重視再利用之侷限，亦挑戰由市府與專業規劃者一手包辦的公共空間再利用機制。在新竹文化協會、文史與社區工作者透過議題式行動確立了空軍十一村的保存命運，在整修經費尚未有著落之際，展開了由園區工程師、學生、文化工作者等市民所組成的湖畔民眾俱樂部進駐行動，期望開啓公共空間的公共性參與。只是這樣的期待與行動卻受制於現有行政體制、市府的空間想像，整修後的空間資源分配，以及進駐社團的公共性與正當性等問題終告落空，亦消磨了湖畔成員的草根動力。最終，空軍十一村與辛公館還是重回官方文化治理的空間再利用機制中，交由市府與專業規劃者進行再利用規劃，繼續擺盪在公辦公營或公辦民營的公共空間經營模式，市民依舊只能以文化義工或參觀者的身份，被召喚進入文化治理場域。

不過，在第五章的建國公園與中巷的空間改造案例中，則是可見市府試圖培力社區，以及社區充分展現自主性行動。市府在宣稱提供建國公園老人更舒適的環境策略下，進行一連串的掃黃行動及建國公園改造工程，將整建後的公園交由社區居民組成的建國公園發展促進會管理。然而，促進會的管理工作卻在市長選舉後，新政權的不同治理方式，以及公園攤販與老人的雙重壓力下，終告停止。中巷文化教育學園計畫則是由關帝廟主導，計畫將中巷風化區恢復 / 改造為文教區，以重振廟風和提升社區生活環境品質，透過將收購的中巷妓女戶改建為圖書館，並且自行撰寫企畫書，向文建會申請社造經費，進行一系列的社區營造活動。關帝廟原訂進行中巷、建國公園與南門街區的空間改造，但由於營建署未通過關帝廟所申請的規劃設計經費，同時關帝廟開始進行古蹟修復工程，因而暫停中巷及周邊空間硬體的改造計畫。

比較官方文化治理、都市社會運動及社區培力或自主行動這三種公共空間再造案例（表 6-1），市府、保存與再利用運動團體及草根社區，皆以文化和歷史之名主導或參與了公共空間的改造，顯示了文化治理作為文化政治的場域，除了是市府統合 / 吸納 / 召喚專業規劃者、文史工作者、社區菁英、建築師、學者以及市民，共享權力與分配資源的實踐機制，同時也是地域社會不同行動者相互挪用、合作、競爭的過程。由文化治理場域的多重行動者身份來看，是否表示新竹市已然朝向市民城市？市民真正具備了主體性與自主性嗎？

表 6-1 1990 年代後期以來新竹市公共空間再造策略之分析

	文化 / 歷史	公共性	邊界劃定（吸納、排除）
官方文化治理	竹塹城歷史、庶民集體記憶、新竹市城市意象	市府和專業規劃者形構的遊戲規則	多元主題的博物館群計畫，菁英美學品味，挪用 / 吸納 / 召喚特定市民認同
都市社會運動	日式建築歷史價值、集體記憶（眷村、新竹中學）	以市民為主體的公共事務決策和文化活動	人物紀念館的召喚、市民社群的特定藝文活動，吸納部分市民認同
社區培力和自主行動	老人泡茶文化、清代考棚文教氣息	特定社區居民的社區營造	恐懼美學化，吸納特定社區居民、商家和消費者，驅離邊緣群體、抹除污穢歷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990 年代後期由市府主導的城市再造計畫主要訴求的是竹塹城的歷史記憶和城市文化意象建構。同樣地，由民間團體發起的歷史空間保存與再利用行動，以及社區空間改造計畫，也是以文化與歷史之名來形構出行動議題的正當性。新竹文化協會與辛公館搶救小組強調空軍十一村和辛工館日式木造建築的歷史價值，後者更藉由辛校長教育理念的論述，進一步構築空間的文化象徵；關帝廟則

選擇性再現中巷作為文教區的歷史記憶。雖然這些行動不是立基在對抗市府專斷的公共決策上的都市社會運動，就是獨立在市府決策的市民自主行動之外，卻也和市府主導的城市再造計畫一樣，皆以文化和歷史之名來打造城市集體象徵、召喚市民認同。除了行動訴求外，這些公共空間再造過程的結果與價值觀也很類似，也就是除卻博物館、紀念館、圖書館、文化活動空間的再利用方式，這些公共空間別無他路。並且，在空間再利用過程中，同時也複製了潔淨、安全、高尚道德等等的主流文化價值。文化治理看似是朝向市民城市的契機，然而卻也隱藏著危機。

在建國公園和中巷的另類空間改造案例中，便直接顯影出文化治理場域中行動者及其召喚的市民主體之身份位置，以及價值觀。不論是由市府主導、社區協助的建國公園改造計畫，或是關帝廟策動的中巷風化區改造為文教區之計畫，皆刻意忽略了建國公園的歷史，選擇性地挪用公園老人族群象徵及中巷文教歷史記憶，來構築空間再造的正當性，吸納特定階級的社區居民或香客參與，排除原先在公園及其周邊活動的邊緣族群。這也顯示出這兩個以文化與歷史之名的空間再造案例，看似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及展現社區自主活力，其實是有所選擇、排他的支配性中產階級美學、特定的歷史與文化之再現過程。再者，即使關帝廟為了將妓女戶改建為圖書館時，拆除了清代遺留下來的古牆，卻未遭受史蹟保存運動者的質疑，似乎打著文教之名，就能免除破壞史蹟的罪名。

因此，新竹市文化治理過程反映的不只是市府以文化與歷史之名來統合 / 整編民間團體、專業規劃者、地方文化菁英，以及召喚市民認同，也是不同行動者皆可運 / 挪用文化和歷史之名來形構正當性，藉此吸納其他市民加入和認同其行動的策略。這種一致性顯現了都市政權理論所論的各種行動者之間的直接或間接聯盟（對抗、協商、合作、培力），即使乍看之下立場不同，但是結果和價值觀很類似。並且，從 1990 年代後期以來新竹市公共空間再造過程來看，文化治理所召喚市民主體通常指認了特定階級，不是將邊緣族群排除於場域之外，就是挪用其族群文化象徵來增加正當性來源。

以 Foucault 的話來說，文化治理的一致性反映的是權力 / 知識等論述轉化為實際權力關係的過程，其中不僅存在著支配他人的技術，也是支配自我 / 自我關注的權力形式，也正是他所謂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文化治理既是不同行動者介入城市公共事務的憑藉，以爭取市民自主權、公共性參與、提升生活環境品質，亦是主流價值、美學與意識型態的再生產機制，行動者藉由特定的文化訴求，吸納 / 召喚特定市民參與，而巧妙地排除邊緣族群的空間實踐。

6.3 選擇邊緣：反思公共空間的支配性

1990 年代後期以來，新竹市公共空間再造過程，其實是透過文化與歷史象徵之生產，建構出主流社會的認同語言，依賴且塑造了公共空間之生產。如果說公共空間是公共文化的主要場所，那麼不論是地方政權、草根運動團體或社區團體，皆利用視覺再現的文化策略，創造出均質化且不平等的新公共文化，隱蔽了供社會活動的公共空間之權力問題。

夏鑄九（1994）提出公共空間的另類計畫藉由動員市民團體、社區居民及其他弱勢者的過程，來重構公共空間的公共性，來矯正無市民的依賴城市使其轉向市民城市，並且期望空間規劃者形構出進步的顛覆性論述，設計出異類群體的異質公共空間。然而，在新竹市的公共空間再造案例中，卻是都市政權的不同行動者共同一再複製著主流與保守論述所形構的理性霸權、透明性凝視、監控機制、高尚道德、純淨世界、安全至上，朝向一個由明確中心價值所收編且再現的新自由主義式之多元文化並陳城市。

不過，有權力的地方就有抵抗。建國公園的老人、攤販、遊民及流鶯等邊緣群體運用其族群身份（老人福利）和工作權益（底層階級攤販），或者翻轉空間布署與凝視的權力（遊民），再次擄獲使用公園的權利。在這座正義與不義交替輪流的城市中，依舊存在著差異、邊緣、矛盾、危險的異質空間，邊緣族群在支配性權力縫隙之間，透過日常生活實踐，抵抗 / 翻轉空間權力布署，重新奪回接近公園的權利。